《明史》記載：

> 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丙辰，賊遷帝、后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大清兵破賊於山海關。五月，入京師，以帝禮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1]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1606-1645）率軍攻取北京，崇禎帝（1611-1644）於三月十九日自縊煤山，直至三月廿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紙票（生卒年不詳）與昌平州官吏商議開壙事，遂開田妃（？-1642）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1611-1644），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同年五月，多爾袞（1612-1650）下令禮葬崇禎、帝后，仍造陵墓如制，多爾袞的諭令意味清朝擬以帝禮處理崇禎的喪事。其後臣工獻策，請議崇禎帝廟號，以彰顯清朝厚德。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1589-1662）也上疏奏請安厝崇禎、帝后，陵曰思陵。

自此，思陵成為象徵明朝裂變的記憶場所，召喚清初文士拜謁為國犧牲的先帝，提供一個思接前朝的回憶通道，相關行動亦衍生不少詩作，具有文學、史學、社會學價值，值得研究。然學界未充分關注此一特殊的悼亡活動尤其是紀錄此一行為的詩作，目前只有朱可欣的《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開展了專門的研究。顧炎武（1613-1682）是清初謁陵者之代表人物，曾七次拜謁南京的明孝陵，六次拜謁北京天壽山的十三陵，包括四次專門拜謁崇禎欑宮。他每次拜謁俱有詩文，又撰成北京天壽山明陵的專著《昌平山水記》。顧炎武謁陵詩文的三處書寫對象有各自

1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4，頁 335。

的象徵意義，南京太祖孝陵象徵明朝的開國史，北方天壽山諸陵引人想起漫長的明朝歷史，崇禎陵寢則指向明亡的關鍵時刻；凡此，開啟了關乎忠義、倫理、道德的諸多議題，亦是文士經歷國變之後文化創傷 (cultural trauma) 的體現，揭示了時間留下的痕跡和詩人對抗遺忘的努力，一系列的謁陵作品亦展現了微縮的詩人心態史。[2] 除了顧炎武之外，筆者廣泛搜集到為數不少的謁陵詩作，[3] 有待抉微發覆。為免重複操作，本文關注顧炎武以外其他文士的謁陵詩作，並以涉及到天壽山「思陵」的詩作為討論中心，因為明代帝國崩解與帝王崩殂之豐富內涵、象徵意義都濃縮在思陵這一方墓地，相關作品值得釐探。

至於研究方法，筆者擬以「創傷」(trauma) 與「療傷」的概念去把握清初的謁陵詩，兩者看似相反實則相互依存，這具有張力的辨證框架有助呈現清初文士在折磨與緩解之間搖擺的複雜心理，窺見諸人在甲申國變後承受怎樣的心理創傷？如何有意無意通過行動療治此一創傷？前賢對於清初文人所經歷的創傷經驗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4] 筆者適時借鑑西方創傷心理、創傷治癒之理論，為行動者背後的心理機制提供解釋，但理論只是工具，藉此審視詩作以通向人心才是目的。要之，本文以明遺民 [5] 為主旁及仕清者拜謁思陵之詩作，窺探改朝換代後文士從創傷到療傷的心路歷程，旨在彌補此一領域研究之不足，拓展有關詩作的詮釋維度。

2 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19 年 9 月），頁 101。

3 筆者以清初的別集、選集、總集中詩作是否提到思陵或其位置為搜索標準，為求全面，文士以天壽山、十三陵為題的詩作若涉及思陵亦納入討論，一些以遙望、遙憶帝陵為題之詩作，則視為補充材料。

4 如李惠儀分析清初女性的國難經歷與對女英雄的文學書寫，見 Wai-Yee Li, “Heroic Transformations: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9, no. 2 (Dec. 1999): 363-443.

5 何冠彪定義明遺民為「就廣義指明亡後不再干謁祿位的人」，見《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05。

第一節

謁陵詩中的創傷復現

（一）蒼涼帝陵

從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譚吉璁（1623-1679）《肅松錄》、梁份（1641-1729）《帝陵圖說》、王源（1648-1710）〈十三陵記〉等著作，可以認知明朝帝陵的佈局與制度，但除了相對理性的「歷史檔案」，貫注主觀色彩的「文學作品」，亦可披露不同政治立場的清初文士對於天壽山的陵墓有怎樣的側重描寫與心靈體認。討論創傷主題之前，此一小節先看諸人眼中的帝陵是如何的蒼茫與悲涼，有助我們想像陵寢建築與山形地勢，以增強現場感。洪若皋（1624-1695）〈遊天壽山．己亥 [1659] 三月十三日〉云：

> 空山何纍纍，殘日照頹垣。行邁者誰子，巡逡陟陵園。華表側亭亭，麒麟欹且蹲。石馬不回頭，翁仲寂無言。麥秀空在野，黍離空在原。蒼鼠竄城牆，穴道流污渾。穹碑傾剝落，燐煸土花翻。陰房鬼火青，沙版綴殘軒。白日錮三泉，珠襦玉匣尊。漆燈久沒滅，蟾蜍玉幽昏。一朝野燒入，徒令碧草痕。憂來藉草坐，黑影橫山門。嗟彼庶民丘，時序操雞豚。今日殷鬻哼，洛邑方駿奔。我聞蒼梧雲，亦有謝公墩。萬物無貴賤，唯德與功存。孔明祠前柏，千歲常殷繁。尼山廟巍巍，萬古薦清樽。[6]

6 洪若皋：《南沙文集》（清康熙刻本），卷 2，頁 6b-7a。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詩經．王風．黍離》），作者來到天壽山的曠野，空山殘日折射興亡歷史，見穹碑剝落，鼠竄城牆，一片瘡痍，「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詰問應在作者腦海中不斷迴盪。此詩不唯道出天壽山之荒蕪，更寫出環境之陰森可怖，廢墟下黑影橫山，鬼火漆燈掩映，陰氣迫人。在作者筆下，埋葬地下之帝王幽靈像是死不瞑目，充滿遺恨地在陰陽之間徘徊不去，滿紙黍離麥秀之悲。洪氏彷彿扮演安撫亡魂之角色，強調「萬物無貴賤，唯德與功存」，是否稱許明朝帝王留下一定的功績？最後以孔子（551 B.C.-479 B.C.）與孔明（181-234）那充滿生氣的歷史遺址對照滿目蕭條的天壽山，更顯張力。

投靠清廷的尤侗（1618-1704）仍眷念明陵，不妨借其作品示現帝陵情境與複雜心境，其〈再過都城遙望天壽山諸陵〉云：

> 黃霧交兵日，青天落帝星。銅駝辭漢殿，鐵馹起秦庭。楊柞新豐闕，松楸古墓扃。雲煙銷壯氣，雷雨護幽冥。石馬嘶黃土，銀狐舞翠屏。珠襦藏玉匣，墨本閟蘭亭。田豎耕犁亂，旗軍獵犬腥。宮花春化蝶，野草暮飛螢。灑掃無三戶，經營空五丁。鼓吹總帳寂，弓劍漆燈熒。泣竹湘妃怨，啼鵑望帝靈。江頭攀細柳，塔下哭冬青。離黍歌猶咽，秋梧夢未醒。昭陵重騁望，涿鹿暫車停。麥飯盃羹斷，金盤涕淚零。山陽風弄笛，棧道雨淋鈴。行役思千里，興衰感百齡。蕭蕭易水上，擊筑寫哀銘。[7]

作者將故國感慨訴諸習見的文化符碼。銅駝辭漢埋荊棘、金盤臨風灑涕淚代指明王朝的崩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啼鵑望帝指涉歷朝先皇，泣竹湘妃引出諸皇后。尤侗孤獨地「江頭攀細柳，塔下哭冬青」，與

7 尤侗：《西堂文集．右北平集》（清康熙刻本），頁 17b-18a。

少人祭祀先帝的場面「麥飯盃羹斷」呼應，滄海桑田之感，溢於言表。「棧道雨淋鈴」，強化環境淒涼之外，還有一個可能性：是否以唐玄宗（685-762）安史之亂後奔蜀聞鈴之「古典」隱喻南明諸帝逃奔南方之「今事」？結句「蕭蕭易水上，擊筑寫哀銘」，借高漸離（生卒年不詳）擊筑訣別荊軻（？-227 B.C.）的事跡渲染眼前的悲壯畫面，並以「哀銘」悼念前朝先帝。通篇典故雖是套語，但互文的交錯組裝，意義的層遞疊加，則指向明清之際新的世運。在此框架下，「楊柞新豐闕，松楸古墓扃。雲煙銷壯氣，雷雨護幽冥。石馬嘶黃土，銀狐舞翠屏」、「田豎耕犁亂，旗軍獵犬腥。宮花春化蝶，野草暮飛螢。灑掃無三戶，經營空五丁」之蒼涼場景，彷彿彌漫着古今騷人墨客對朝代興衰的深沉感慨，擴展了歷史的縱深感。

（二）陵前復現創傷記憶

何謂「創傷」？無論是 Sigmund Freud 或 Cathy Caruth 對創傷的定義，[8] 都無法完全適用於下文的研究對象，因為清初文士有能力謁陵並書寫此一行為，乃屬於在生活中復常的表徵（詳後）。因此，筆者採納一個適用於本文框架由 Charles R. Figley 提出的定義：「創傷的受害者是指一

8 ［奧］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奧］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216。Cathy Caruth 認為：「創傷是最初無法確認感知，事後反覆纏繞主體的方式。……創傷描述的是一種對於突發或災難事件的震驚經驗，在這種經驗中，對這種事件的反應通常是延遲的，發生不受控制的重複幻覺或其他侵入的現象。」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 11.

個處在創傷經歷的復原與解決過程中，並努力去理解創傷事件的記憶的人。」[9] 此外，古人是否經歷過病理學上所定義的創傷，現在已難如實診斷，但諸人通過文學書寫創傷體驗則是明確之事實。換言之，在文學世界，清初遺民都宣稱甲申國變為他們帶來不同程度的創傷，稱之為「文學示現的創傷」實不為過，誠如 Kalí Tal 所言：「創傷的文學是由它的作者身份來定義的。創傷的文學以創傷經歷的重構 (reconstruction) 與復原 (recuperation) 為中心。」[10] 據此，相關詩作字裏行間（文學世界）示現的創傷重構與復原，正是本文關注的核心。

清初文人在前朝記憶的驅使下謁陵，確切的地點與有形的陵墓提供一個維護記憶的載體，[11] 親臨帝陵觸發行動者的回憶活動，儼然自揭瘡疤，將之暴露在帝王死亡的陰影之下。從以下詩作可知，諸人踏足帝陵遺跡，容易激發連串政治動亂有關的創傷記憶，[12] 深感昔日的政權體制、君臣關係被剝奪瓦解，所謂「君臣此日怨參商」，[13] 傷逝與悲憤交織，形諸文字則示現不同程度的創傷。

康熙三年（1664），閻爾梅（1603-1679）〈謁先帝陵哭之〉（陵在天

9 Charles R. Figley, "Post-Traumatic Family Therapy," In *Post-Traumatic Therapy and Victims of Violence*, ed. Frank M. Ochberg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8), p. 86.

10 Kalí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

11 研究者認為地方因其穩定不變的性質，乃作為保存、維護記憶的有效載體，有助於記憶活動。見 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6-187.

12 研究者指出觸發創傷記憶的外在情境 (extrinsic contexts) 包括相似的氣氛、聲音、氣味、情緒等。借鑑其說，甲申國變對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來說是創傷事件，當他們置身特定的外在情境如前朝陵墓，可催生出排山倒海的回憶。個體的創傷經驗，若提升到群體的層面來觀察，不妨視作集體創傷 (collective trauma)。見 Jay Winter and Emmanuel Sivan, eds.,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19.

13 屈大均〈沙河悵望〉，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卷 4，頁 446。

壽之西，今稱小紅門。）云：

> 遁迹江湖二十春，潛來故國察風塵。煤山改作拓魂路，柴市慚無灑血人。褒剪圓蹄充靺鞨，纓蟠小頂飾金銀。可憐天壽諸陵戶，猶點香燈哭忌辰（三月十九日事）。[14]

三月十九崇禎帝忌日就像紀念碑般觸目驚心，提醒明人銘記先帝之死與家國之變。閻爾梅在傷感日子拜祭陵寢，「潛來故國察風塵」，一個「潛」字寫出那種偷偷摸摸的卑微與弱勢，壓抑與惶恐兼而有之；環境寂然，他遺世獨立，深感同道日稀，[15] 洵為明亡清興之時代縮影。作者充滿儀式感地換上靺鞨與冠纓，「猶點香燈哭忌辰」，再以哭泣行為釋放在此場所勾起的悲痛，完成了這適用於自身的謁陵儀式，簡樸但能充分表達哀思。

李沂（生卒年不詳）〈鹿馬山人歌〉記載一個動人的故事：「鹿馬山，烈皇帝葬處也。關中王弘撰，於三月十九日，匍匐山下泣奠，自稱鹿馬山人，陽山李沂再拜作歌。」詩只有三句：

> 鹿馬山頭妖鳥啼，鹿馬山下草離離，鹿馬山人空涕洟。[16]

王弘撰（1622-1702）在崇禎帝忌日前往祭悼，自稱是守陵者「鹿馬山人」，先帝辭世也甘願為他服務，每一臨之，涕泗縱橫。可見此日此山為王氏帶來纏繞不去的創傷，亦引發聞者想像其悲慟的情狀。

14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耷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頁 487。

15 蒙學報審查人提醒，此詩或與閻氏當時被清廷追捕、入京求救有關，身處生命威脅之下，「柴市灑血人」或為自誓。

16 卓爾堪選輯：《遺民詩》（清康熙刻本），卷 9，頁 7b。

康熙七年（1668），屈大均（1630-1696）〈西山口攢宮[17]〉云：

> 哀痛千秋血詔傳，遺臣何以報皇天。山河萬里留東澳，兵甲三朝喪朔邊。竟使單于封馬鬣，可堪常侍握龍淵。酬恩自矢唯溝壑，化作啼烏玉樹前。（其一）
>
> 乾坤此變恨無窮，雨雪淒淒葬梓宮。血灑海棠中使見，神歸天穴貴妃同。真孤倉卒人難託，微服艱難路不通。隧道有誰陳麥飯，年年杜宇哭春風。（其二）
>
> 銀山鐵壁接雲中，可惜龍盤萬里雄。三輔莫遮回紇馬，九門誰撤羽林戎。心傷玉匣蛟龍少，淚灑煤山草木紅。此日六軍猶縞素，報仇應解奮秦弓。（其三）[18]

第一首，作者擬想崇禎帝臨死撰寫詔書之淒慘畫面，難免「哀痛千秋」，揭示這是難以忘卻的創傷記憶，甚至願意死後化身啼烏守護帝陵（化作啼烏玉樹前），以酬前朝厚恩。第二首，翁山述崇禎帝血灑煤山海棠之事，所謂「乾坤此變恨無窮」，後人在淒淒雨雪中埋葬帝君，但此後「隧道有誰陳麥飯」？空餘杜鵑鳥（崇禎帝）在啼哭。第三首，「心傷玉匣蛟龍少，淚灑煤山草木紅」，在陵墓這銘刻死亡的媒介誘發下，先帝血濺煤山之記憶糾纏難除，詩人甚至咬牙切齒，將創傷轉化為能量，激起為明復仇之意念。其〈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云：「憤師

17 屈大均、梁份等人用「攢宮」取代「思陵」一詞，都是受到顧炎武的啟發。顧炎武《昌平山水記》云：「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顧炎武認為明末流賊橫行，清人不具有為明復仇的資格，故對其禮葬崇禎並不領情；亦可理解為他站在明朝臣子的立場，暗指清人為竊國之「賊」，詳見朱可欣《顧炎武謁陵詩文研究》，頁 82-83。

18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 4，頁 443。

讎兮未復，與國恥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報之。」[19] 可作為此詩的注腳。屈大均在國變後持續聯繫志士，參與復明運動，直到康熙年間仍加入三藩陣營抗清，從其謁陵詩可見為明復仇的決心何其熾烈。

翁山與以下所述文士，雖然不是崇禎帝以身殉國的現場見證者，但種種有關此事的耳聞與記載，為他們帶來突發的驚駭與不同程度的創傷，輒將相關材料組織串聯，提煉成詩。當中不乏主觀的想像、渲染與誇飾，有意無意製造出「我」就是歷史現場見證人的錯覺，於是甲申山河巨變、崇禎煤山自縊，悲壯得宛然在目。

同一年，屈大均〈天壽山〉對帝陵之感慨應包含思陵，詩云：

> 萬壑松楸盡，園陵鎖寂寥。空餘龍虎抱，似有鬼神朝。銀海陰風落，珠塵細雨飄。天南霜露思，極望草蕭蕭。（其四）
>
> 輦道哀湍激，神樓晚日懸。九龍無彷彿，群鶴尚聯翩。玉碗淪秋草，珠簾落暮煙。白頭宮監在，相對淚潸然。（其五）[20]

詩人眼看落日衰草，身承陰風細雨，耳聽激湍苦聲，不得不撫今追昔。玉碗珠簾等前朝遺物掩沒在殘山剩水，滿目蒼然。面對帝國消亡，屈大均與擁有共同經驗的守陵宮監相對潸然，乃將無形的悲痛與共鳴付諸有形的淚水。

潘問奇（1632-1695）[21] 不斷書寫帝陵，體現出對逝者的深切悼念，其〈思陵〉曰：

19 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冊 3，頁 230-231。

20 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卷 4，頁 440。

21 潘問奇在甲申之變時未成年，但深受明遺民的事跡觸動而不斷懷想明朝，是以卓爾堪將其人其詩收進《遺民詩》，筆者將在第五章述潘問奇的政治認同與心境轉折，作為本章以外的個案研究。

> 白髮中涓雪數莖，坐譚遺事欲吞聲。納肝未必皆弘演，銜璧何曾學子嬰。寒食遣官昭代澤，敝衣釃酒野人情。荒山賦罷西風急，萬壑松濤自不平。[22]

當悼念主體靠近思陵容易湧現相關記憶，與人談及甲申遺事自是悲從中來。頷聯道出自身的政治抉擇，雖不能如弘演（？-660 B.C.）般為國君殉難，[23] 但亦未如子嬰（？-206 B.C.）般銜璧投降，[24] 不至辱沒此身；此聯出句亦可解讀為諷刺明代朝臣不願為國捐軀，對句則是嘆惋崇禎皇帝不失為死社稷之君。頸聯一方面述遣官守陵之新朝恩澤，一方面述眷戀前朝之敝衣野人，反映在朝在野行動者背後不同的政治取向，饒有張力。尾聯寫山荒風急之蒼茫，那起伏之松濤投射作者複雜之感受。

康熙十六至十七年（1677-1678），陶季（生卒年不詳）〈過天壽山諸陵三首〉其三云：

> 攀陟苦日短，秉燭照無寐。霜晨歷西巘，迫我意憔悴。入門見髮几，雨急迸老淚。衣褐拜思陵，蓬中辨幽隧。金鳧不可問，草草歿九地。載瞻碑版詞，所以愧有位。當時遘倉卒，大節幾人遂。千秋忠閹墓，宜付史臣記。（思陵西偏，即王承恩葬處，今有碣。）[25]

22 潘問奇：《拜鵑堂詩集》（清康熙刻本），卷 2，頁 23b。

23 《呂氏春秋》：「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褓。』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呂不韋編，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11，頁 249。

24 《史記 ·李斯列傳》：「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卷 87，頁 2563。

25 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卷 9，頁 13a。

甲申事變三十多年後，作者攀山涉水過天壽山拜謁思陵，蓬中幽隧不但通往陵寢，亦是通往前朝記憶的甬道。詩人用憔悴的身軀尋覓與靠近墓園，莊嚴的建築與死亡的氣息導致他「雨急迸老淚」；帝王去矣，空餘古陵殘碑，深感如王承恩（？-1644）的殉節者少。

（三）陵外觸發創傷記憶

創傷作為一種難受的身心體驗，常被相關或不相關的情境觸發，就像一個容易誤鳴的警報器纏繞創傷者的日常生活而有隨時被觸動的可能。清初士人非但於崇禎陵墓之前復現創傷記憶，在陵墓之外也有如此徵象。

潘問奇〈昌平吳宮璧太守招遊德勝口明日度紅門暮宿花塔寺二首〉云：

> 立馬川原上，霜林一半青。地餘龍虎氣，山裂鳳凰形。古木俱堪弔，悲風不可聽。登臨雖勝事，淚落此郊坰。（其一）[26]

作者將赴帝陵紅門，裂山、古木、悲風勾起他強烈的弔喪情緒，化成難以遏抑的涕淚。可見創傷主體與陵墓仍有一段距離，外界相關訊號都會敲響內心敏感的警鈴，使之心潮澎湃，難以平息。

潘問奇〈雨中桂花次劉鶴舉韻〉云：

> 秋色瀟瀟溼莫煙，有人憔悴在花前。兒時折向西泠路，猶記思陵十五年。（吾郡桂花唯滿家巷為最盛。歲壬午，侍先大人飲花下，時余年纔毀齒。易姓後不數歸里，歸亦未續舊遊，荏苒五十餘禩矣。今讀鶴舉作，滄桑家國，觸景為之黯然。）[27]

雨中桂花作為掀起創傷記憶的外在情境，讓作者陷入世變滄桑的感慨之中。空間的阻隔深化其對前朝的緬懷，現在的事物如桂花難以為詩人帶來真正的愉悅，大抵因為他尚未從國變的陰霾走出來。驚弓之鳥般警覺的身心狀態，令他難以完全投入眼前生活，容易被外在一些媒介揭開各種刻骨銘心的前朝記憶。

蔣楛（1628-？）〈詠陳皇士天壽山小松〉（松係其尊人明鄉先生自京攜種栽出）亦有相似描寫：

> 燕山陵墓鬱龍蟠，回首喬林佳氣闌。遙憶侍臣叨扈從，獨攜松子出長安。牛羊躑躅豐碑臥，禾黍蒼茫夕照殘。自是天心存舊物，不勞封爵比秦官。[28]

此詩述陳濟生（1618-1664，字皇士）尊人移植天壽山小松之事。此松雖小，卻有延續家族與國族記憶的象徵意義，成為陳濟生以堅韌意志抵抗新朝政權之寄託。此一故事觸動作者有關天壽山異代蕭條的想像。詩中昔盛今衰之對照，令陳濟生或蔣楛，都像立於「禾黍蒼茫夕照殘」中難掩傷痛。

潘問奇不時與同道中人談及謁陵之念。其〈花朝前三日集夢岩齊頭分韻〉云：

> 流漸已改憶風湍，柳欲煙時可脫冠。銀燭未銷三寸淚，錦裘初

26 潘問奇：《拜鵑堂詩集》，卷 2，頁 18b-19a。

27 潘問奇：《拜鵑堂詩集》，卷 4，頁 28b-29a。

28 蔣楛：《天涯詩鈔》（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丘如升刻本），卷 1，頁 4a-4b。

滅一分寒。俄驚紫燕將歸社，擬覓金鳧又解鞍。春夢不成人意好，薊門何日有花看。（約赴天壽山不果，故頸聯及之。）[29]

未能親赴天壽山拜謁先皇，對詩人而言無疑是憾事，盎然春意之中仍悲嘆「銀燭未銷三寸淚」，家國斷裂之痛隱然在焉。

潘問奇〈天壽山祝髮詩〉有引云：「辛未 [1691] 南歸，夢岩贈句，已有天壽之約。癸酉 [1693] 冬，復申前語，勸駕頗勤，并索詩，漫成四首。」詩曰：

猨臂生來數每奇，回思綵筆首低垂。骨非駿馬為儒錯，心比蓮華向佛遲。不信五窮真有鬼，但求一飽竟無時。今朝獨背歡場去，欲折江蘋寄所知。（其一）

髮在成僧已十年，何須鉼鉢始求禪。盡償杜宇傷心債，飽領荷絲薄命緣。殘席漸成將散客，慈雲不少再生天。茅庵一任比丘卜，天壽山頭鹿正眠。（其二）

龍蛇戰後久無家，雲水今纔駐一涯。寢廟鼯鼠同蹈海，橋陵風雨當懷沙。山中應接皆秋色，物外寒暄有莫鴉。獨恨浮生拋不早，少年場裏負袈裟。（其三）

蓮在淤泥性未空，寂寥身世自兒童。鳥名精衛無非怨，花到棠梨不是紅。一杖煙霞成事業，五陵裘馬讓英雄。何時識得廬山面，茵廁無心問化工。（其四）[30]

時至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距離甲申之變已四十九年，詩人在生命最後階段仍與同儕相互勸勉赴祭帝陵，證明當初的國變創傷留下難以磨

29 潘問奇：《拜鵑堂詩集》，卷 3，頁 27a-27b。

30 潘問奇：《拜鵑堂詩集》，卷 4，頁 27b-28b。

滅的烙痕。他自我剖白地說：「盡償杜宇傷心債，飽領荷絲薄命緣」，以一種情感內耗的方式償還前朝之債，揭示大半生之傷心次數與程度超乎常人。「骨非駿馬為儒錯，心比蓮華向佛遲」、「獨恨浮生拋不早，少年場裏負袈裟」，作者悔恨不早點擺脫入世的價值觀而皈依佛門，藉由信仰的轉移以尋求精神慰藉，說明成僧之前家國之痛一定程度困擾着他，加上貧寒交迫，不斷積累的心靈苦痛可以想見。成為佛教徒就能擺脫傷悲嗎？「鳥名精衛無非怨，花到棠梨不是紅」，以精衛填海、棠梨色衰帶出徒勞無功的怨歎。可見潘氏晚年對弔祭天壽山之事仍持有執念，此地有關國破君亡的深刻記憶不能輕易剔除。

遭受創傷的個體容易衍生相關夢境，[31] 丘天民（生卒年不詳）〈甲申小山度歲〉其二云：

乾坤百六走龍蛇，老屋荒江我爾嗟。錦繡椒觴南國頌，蕭條麥飯故宮賒。魂依雪窖諸陵夢，淚灑冰天帝子家。有酒盈樽誰忍醉，相看憔悴倚梅花。[32]

國變之年，兵荒馬亂，丘氏暫時無法向先帝獻上麥飯，此一遺憾唯於夢中補償，故云：「魂依雪窖諸陵夢」，乃至淚如雨下。

康熙十年（1671），王夫之（1619-1692）〈辛亥三月十一夜夢登天壽山〉云：

五雲飛不息，唯繞五更心。啼鳥驚山曙，餘寒擁宿陰。寶刀悲

31 論者指出：「創傷記憶是絕對的印記，此在夢魘與倒敘幻覺時，就跟事件一樣真實」，見 Cathy Caruth, ed. and intro.,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32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 10，頁 2b。

自昔，玉盌已非今。杳杳蒼龍闕，微生與陸沈。[33]

作者寫夢見登天壽山之事。詩中意象破碎支離，幻影幢幢，提到寶刀玉盌面目全非，天壽山之帝王已逝，國族分崩離析，剝奪感非常強烈，說明神州陸沉的竭盡 (exhaustion) 之悲在現實與夢中都為作者帶來一定的折磨。詩人做夢也渴望登天壽山拜謁先帝，是日間那如鉛石壓在心頭的國變記憶促成的。可知創傷記憶對心靈的擾亂對某些人是持久的，有時候無論在現實或夢境、顯意識或潛意識都無所逃遁。

趙爾圻（生卒年不詳）〈惡風折海棠行〉亦提到有關崇禎帝之夢，可資補充，詩下半云：

輕車不侈山陵路，身終聿昭儉素德。紫榛金醪白琅霜，會稽梧野老仙鄉。我皇神遊天庭不可測，龍蜕有翼矯雲驤。臣圻抵死不忍誄，夢灑筆花千片淚。恨爾賊曹鉤吻斷腸類，斬除不饒爾寸碎。我皇顏色芳馨在，終古與臣恨血繞，空傳花不化土。[34]

「夢灑筆花千片淚」，揭櫫作者日間的悲憤轉化成夜間的夢魘，非自願復現的創傷記憶一次又一次侵入夢中，像逼真的劇場一幕又幕地重演。

（四）與非創傷者的對照

事物之對比更能彰顯某方特徵，不單明遺民書寫明陵，自覺效忠清朝的文人亦然。順治十六年（1659），順治皇帝（1638-1661）曾為崇禎

33 王夫之：《薑齋詩集 ·薑齋詩編年稿》，收入《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冊 15，頁 540。

34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卷 10，頁 5a。

撰寫祭文：

唯帝亶聰御極，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十七年來，劼毖無斁。不意流寇猖獗，國遂以傾，身殉社稷。向使遭際景運，可稱懿辟。獨是纘承衰緒，適丁劫厄，雖勵精圖治，而傾廈莫支。朕念及此，恆用深惻。茲巡幸畿輔，偶過昌平，睇望陵寢，益為悽然。特具牲帛酒品，用昭禮祭。尚饗。[35]

清朝帝王禮葬崇禎並保護勝朝陵寢，其政治動機是闡揚明朝慘被流寇推翻之後，為明朝復仇的清兵屬於義軍，其對漢族的統治自有正統性。古代「祀」的意義就在於表達秩序，國家祭祀的主祭身份象徵着國家最高的權力。特定的儀式不斷強化這種秩序，祭祀的等級象徵着權力的等級，擁有主祭權則意味着掌握國家的統治權。[36] 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下，一些認同新政權的文人響應清朝帝王謁陵的行為而到天壽山憑弔，然相關詩作無明顯的創傷痕跡，意圖歌功頌德，恰與前引的詩作形成對照。

如高士奇（1645-1704）〈昌平懷古〉云：

居庸山勢接崎嶔，大野蕭蕭王氣沈。遺老孤邨談舊事，寒天斜日落城陰。寶衣幸免荒原火，金鼎猶昭隔代歆。（昌平天壽山，明諸陵在焉，猶命內監守之，嚴禁樵採，歲時祭祀，誠本朝聖政也。）雪後登樓聊騁望，匏尊莫惜醉餘斟。[37]

35 《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30，頁 1006。

36 廖小東：《政治儀式與權力秩序：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53。

37 高士奇：《青吟堂全集 · 城北集》（清康熙朗潤堂刻本），卷 7，頁 11a。

呂履恆（1650？-1719）〈天壽山〉云：

> 天壽山前御道長，先朝陵寢未全荒。青松落落吹陰壑，白日昭昭下古牆。一帶川原風浩蕩，百年龍虎氣潛藏。即今典祀仍修舉，地下銜悲泣數行。（國朝修護前朝諸陵，真古今曠典。）[38]

佟世思（1651-1692）〈十三陵十二首〉云：

> 戰罷中原烽燧收，國朝恩許護松楸。帝王異代尊如昔，風雨諸陵人自愁。碑斷蛟龍憑死樹，山昏猿狖叫高秋。紛紛黃葉宮奴掃，老病旭羸盡白頭。（其五）[39]

可見局外人對先朝陵寢的描寫屬於寬泛的詠古，籠統地勾勒環境與事跡，作者面目有點含糊，書寫歷史滄桑之外，藉着地景歌頌清朝對明陵的尊禮與保護政策，在主體意識、抒情力度與感染力量都比不上明遺民經歷國變之創傷書寫。

再看一例，趙吉士（1628-1706）〈十二陵九詠〉[40] 序曰：「［……］順治定鼎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仍置內監司香，月給俸食。至今遣官致祭，禁樵蘇，深仁厚德，開萬年有道之長，近古未有」，乃讚頌清帝崇禮勝朝之舉寬洪大度，誠為古今曠典，詩中提到思陵亦體現此價值判斷：「傳說錦屏常駐蹕，荒陵酹酒泣思宗。（田妃墓在錦屏山麓，士民開田妃壙，安葬思宗及周皇后，非復諸陵壯觀。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世祖駐思陵拜奠，大慟，從臣皆泣下。）」則將順治皇帝塑造成充滿悲憫意識的正面形象，具有仁君風範，可見有意操控之詩作可成為點綴太平之工具，政權轉移之時勢使然也。

38 呂履恆：《夢月巖詩集》（清雍正三年 [1725] 刻本），卷 16，頁 19b-20a。

39 佟世思：《與梅堂遺集》（清康熙刻本），卷 9，頁 5a-5b。

40 趙吉士：《萬青閣全集．萬青閣自訂詩》（清康熙趙繼抃等刻本），頁 116b-118b。

這揭示對同一題材之書寫，不同人的身份與際遇都有截然不同的側重點，更能闡明甲申國變這突發 (sudden)、難以預測 (unpredictable) 的事件，為明遺民帶來強烈的驚駭與不同程度的創傷，留下難以擦拭的印記，伴隨之創傷記憶則容易被外在情境如帝陵有關之地景、想像、夢境一再觸發。更甚者，這讓一些人陷入創傷復現的循環之圈，往事片段歷歷在目，形成積壓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而相關詩作為我們提供一個凝視創傷心靈的媒介。

Cathy Caruth 指出：「創傷是與事件的突發相遇，此一過程是出乎意料和恐怖的，無法被置於此前的知識結構，難以成為可以認知的東西，因此才會在此後持續回歸。」[41] 闡明若將創傷經驗整合為既有常識化、常規化的理解模式，這種陳詞濫調或許失去描述創傷事件的精確性、特殊性與指涉力。對於創傷主體在事後訴諸語言的「敘述記憶」(narrative memory)，Cathy Caruth 警惕地說：「言說的危險，也就是被整合到敘述記憶的危險，或許不在於敘述記憶不能理解什麼，而是以為它能理解許多。」[42] 這些論述亦呼應其對創傷理論的基本立場，強調創傷主體難以在清醒或顯意識的狀態下以言語描述一些超出認知結構的創傷回憶，患者不能回憶與逃避回憶都是常見的結果。雖然 Cathy Caruth 認同文學能一定程度描寫創傷，[43] 然而，其「創傷難以言說」的研究近年受到學界的挑戰，如 Richard J. Mcnally 在不少案例基礎的研究上，指出創傷受害者大

41 Cathy Caruth, ed. and intro.,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p. 153.

42 Cathy Caruth, ed. and intro.,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p. 154.

43 Cathy Caruth 強調文學是描述創傷的媒介，因為它超越一般的認知範圍與理論。見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 5.

多能銘記創傷回憶，並有能力描述過去的創傷。[44]

引而申之，不妨藉着中國謁陵詩作與西方創傷理論開展對話。甲申國變的突發創傷能夠言說嗎？相關詩作屬於事後被整合的陳詞濫調嗎？有格律規範的詩作會否失去描述創傷事件的精確性、特殊性與指涉力？值得大家深思。綜觀全文詩作，清初謁陵詩也有套路的表述如典故運用，但不少作者有能力藉着詩作對國變追憶、抒懷與表態，以具有臨場感與感染力之筆墨描寫陵墓與記錄創傷，示現個體的崩潰情緒與生命情境。不同的寫作主體均因應各自的生平遭遇、時空環境、政治形勢而表達不同的情思內涵，諸人亦革新謁陵詩的內容與思想（詳後），體現其為特殊事件描摹與賦義的技能，相關作品即使不能「完全」還原創傷場景與刻劃創傷感受，也是後人藉此趨近寫作主體的記憶與情思之可靠線索，具有呈現「個體真相」的文學價值。凡此，在回答創傷能否言說的問題之前，也許還要問清楚創傷的主體是誰？明遺民屬於傳統中國文人的精英階層，其深厚的文化素養積澱強大的語言表述能力，當中不乏在國難之後扮演見證者，為紀錄自身、他人、國族的創傷而存活下去的，若武斷地質疑他們苦心經營的詩作都是陳詞濫調不能重現或言說創傷，似乎有失公允。

44 詳見 Richard J. McNally, *Remembering Traum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二節

謁陵詩中的療傷作用

（一）舒放情緒與界定事件

明遺民創傷與愧疚交加，但既然選擇存活，日子總得要過。下文嘗試指出，「創傷」與「療傷」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行動者在書寫創傷的同時，亦體現出一定效用的療傷過程。雖然這種療傷不能將昔日創傷完全撫平與抹除，達至徹底的療癒，但他們「有意或無意」的思想行為對於緩和傷痛具有積極作用。

明遺民一再謁陵與書寫謁陵，除了是政治認同如懷想前朝、抗清復明等的原因促成，亦有不自覺的潛意識使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自我防衛或自我復原的心理機制。他們反覆回憶與敘述創傷經歷，將潛意識中壓抑的、破碎的、難言的創傷感受浮升到顯意識層面，屬於一種復現 / 舒放行為 (acting out)。[45] 有關創傷後的敘述治癒，Judith Lewis Herman 之說具有啟發：

> 慢慢地在時間與歷史的背景中，重置出一個有組織的、詳細的語言記錄。故事不止包括事件本身，也包括倖存者對事件的反應和生活中重要他人的反應。……沒有創傷意象和身體感受的敘述是貧乏而不完整的。創傷療癒的最終目標，是要將故事及其間的意象形諸

45 acting out 指患者有意識地重現或宣洩創傷，屬於一種行動化復現，是修補創傷的過程。見 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08-210.